

巴爾札克的雄心壯志

吳錫德

「法國社會將成為歷史家，我只應當充當它的秘書。〔……〕我或許就能夠寫出一部許多歷史家所忽略了的那種歷史，也就是風俗史。我將不厭其煩，不畏其難，來努力完成這套關於十九世紀法國的著作。」

這是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在1842年整理其作品，並計畫將他的全部創作（包括構想中的，以及將來可能寫出的），以《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為總結，所寫下的〈序言〉的片段。在此，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宏偉鉅構」的創舉，也得知他的偉大抱負：他設想以文學家之筆成為法國歷史的撰述者。事實上，在「文學家」尚未普受肯定的時代，他更喜愛以「歷史學家」自況。他一生筆耕不輟，在短短幾年的寫作生涯中，寫下了近百部作品，迄今依舊膾炙人口，不僅是彼時最多產的作家，也是最豐富多元的文藝創作家，他還是公認「現代小說之父」。他幾乎獲得同代文學大家的一致肯定，從雨果、斯湯達爾、拉馬丁、波特萊爾以及喬治桑等人的推崇及肯定。他的好友雨果（他倆1828年即結識）在他的告別式上的追悼文字，不僅鏗鏘有力、撼動人心，也道出了人們衷心敬意及惋惜：

「在最偉大的人物當中，巴爾札克屬於頭等的一個，在最優秀的人物當中，巴爾札克是出類拔萃的一個……。〔……〕喔！這位強壯且不知疲倦，這位哲學家、思想家，這位詩人和天才，曾經和我們一起經歷了生活的戰鬥狂瀾、日常的爭吵與搏鬥，正如各個時代所有偉大人物都經歷過的一樣。今天他終於在這裡安息了。他擺脫了非議與仇恨，在走進這墳墓的當天，也進入了光榮。從今以後，他將超然凌駕於籠罩在我們眾人頭頂的雲霧之上，在祖國的星空閃閃發光。」

稱譽巴爾札克是「天才」似乎一點也不為過，他的文學生涯多彩多姿，如繁花簇錦，一生集合作家（他是法國「文學家協會」的共同發起人）、文學批評家、藝術評論家、散文家、劇作家、記者、印刷業者於一身，甚至還曾是「中國通」，還發表過對中華文化的評論文（〈中國與中國人〉，1846）。他不僅是法國小說藝術（甚至可以說全部西方小說）的革新者，「批評寫實主義」（Critique Réalisme）的領頭羊代表人物，他的寫作既多元、又系統。小說創作題材多樣多式，包括歷史小說、政治小說、哲理小說、怪誕小說、詩意小說，心理小說等等。他也被視為「浪漫主義」派小說家以及「現代主義文學」的

鼻祖。單純地將他歸類為「寫實文學小說家」，似乎就忽略了他的才華與成就。

巴爾札克年輕時即展露他對人間事物的高度好奇，在巴黎大學就讀時雖主修法律，卻同時旁聽文學院課程，主動進修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自然科學課程，一邊還到公證人事務所見習。這些知識涉獵與經驗大大豐富了他的視野及體驗。加上他的細心觀察，勤於思考，也躬於實踐，才成為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全方位、百科全書式的小說家。

連赫赫有名的德國經濟學家恩格斯（F. Engels）也驚訝於他知識的專精：「在他的《人間喜劇》裡，給予了我們一部法國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他安置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從這個歷史裡，甚至在經濟的細節上，我所學到的東西也比從當時所有專門歷史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全部著作合攏起來所學到的還要多。」總之，研究現代西方文學，探尋其肇因及發展，絕不能略過巴爾札克及其時代。

巴爾札克的時代

巴爾札克生活在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那是一個政治動盪社會不安的多事之秋。他一生經歷拿破崙帝制（1799年之際，拿破崙剛剛結束十年的血腥革命，以「第一執政」做為國家實際領導人）。然後經歷他的兵敗（1815），以及王權的復辟（路易十八）。由於法國之兵荒馬亂多年，人民疲累也厭倦政治，也就相安無事。但1824年繼位的查理十世卻激進想恢復舊勢力，製造了政治對立、白色恐怖。因而爆發1830年的「七月革命」。

「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但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派卻擁護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浦登上

王位，建立了「七月王朝」。「七月王朝」的18年統治，除了1840年後的五、六年相對安定時期外，其餘十幾年，幾乎經常處於起義、騷動、密謀和要求改革的運動之中。1848年二月，路易－菲利浦拒絕改革選舉制度，巴黎工人和革命群眾舉行武裝起義，推翻了「七月王朝」。但是，「二月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資產主義共和派奪得，成立了以拉馬丁為首的臨時政府。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對無產階級的強大力量深感恐懼，於是，對工人實行高壓政策，終於導致1848年六月巴黎工人起義，但很快遭受血腥鎮壓。在資產階級內部競選中，拿破崙一世的姪子路易－拿破崙（Louis Napoléon）上台，並在1850年發動政變，實行專制獨裁。

19世紀前半期的法國，對外除戰火連連外，強敵壓境，對內則政爭不斷，社會動盪，階級對立（包括對封建舊勢力、新興中產階級、廣大民眾及工人運動）。代表封建貴族地主和天主教勢力的極端保皇派，代表部分官僚、大地主和工商業主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派，與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和部分銀行家的自由派。這三個政治集團之間的鬥爭十分激烈。人們彼此爭權奪利，而且激烈血腥，至互不相讓、你死我活的地步。

事實上，法國從拿破崙執政時期即已接受資本主義，大力推動商業活動，直到路易－拿破崙登上總統寶座，經濟與民生問題一直都是根本因素。資本主義以及相伴隨的工業革命（法國正式在此時轉為工業革命時期），歷屆國家政權莫不接納資本主義的模式，資產階級以及它所代表的價值，甚至律法、及其遊戲規則皆成了社會主流。總之，自由流動的資本，成為社會的動力，因而也就成為個人欲望的對象。於是，對金錢的追求，為金錢的爭鬥，大工商業對金錢的運用，成為這一時期社會的主要特徵。

這個時期，法國的經濟發展毋寧是有所進展的，追求財富成了「全民運動」，追逐權力也成了「全民遊戲」。正是這樣一幅社會場景，提供了巴爾扎克揮灑的空間。此外，在這個時期也是思想解放，讓人們暢所欲言的時期。反之，1850年路易－拿破崙稱帝後，法國又進入到另一個思想禁錮的時期，政治力無時無刻不在干擾文藝與思想的創作及迸發。

巴爾扎克出身中產階級，熟悉其習性，卻對其不懷好感。但深知這股上升的勢力銳不可擋。他的文學作品的基調與主軸是「反資本主義」的。他想透過文學來揭露資產階級的種種弊端。他一生相當崇拜拿破崙，也認為社會可以透過英雄而獲得拯救。他也曾誇下海口地說：「我要以筆完成他（拿破崙）用劍未能完成的偉業」（Ce qu'il a entrepris par l'épée, je l'accomplirai par la plume.）。質言之，巴爾扎克的創作目標仍是具有社會性的，首先他以「歷史學家」自許，其次，他要揭發社會惡習，最後他想寫人。他在《人間喜劇》〈序言〉寫道：「這套有待完成的作品應當表現三種型態：男人、女人和事物，也就是寫人，寫其思想的物質表現；總之，是要寫人與生活。」也因此巴爾扎克的創作核心價值中，便有了這樣的「社會使命」，復以，他逼真寫實的描述，他的創作風格才被賦予「批判寫實主義」的封號。

文學建構與風格

如果說巴爾扎克用文學完成了一部19世紀前半葉的法國歷史，古今中外的學者，甚至歷史研究專家也不致於否定他。巴爾扎克的文學創作既是文學美學，也是歷史文獻，更匯集許多深邃思考的哲理思辨，這是巴爾扎克永遠值得人們探索

的地方。中國大陸學者艾珉提過：「巴爾扎克拓展了小說的藝術空間，幾乎無限度地擴大了文學的題材，讓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彷彿與文學詩情畫意格格不入的東西，都在他筆下得到了富於詩意的描繪；巴爾扎克是小說藝術的革新者，他將戲劇、史詩、繪畫、雕塑等多種藝術型式的表現手法融於一爐，把敘事、描寫、造型、抒情、對話等等交織在一起，大大豐富和完善了小說的藝術技巧，使之成為一種表現力極強的綜合性的藝術形式。」

法國彼時著名的文藝評論家丹納（H. Taine）在1858年寫的《論巴爾扎克》中就提出，「他（巴爾扎克）是一位獨特的，以嶄新的方法描寫人的藝術家」。「他的寫作習慣與現代人的生活習慣完全吻合，作家得到了讀者的認可」。又說「思想豐富成就了他的偉大。」

◎《人間喜劇》的建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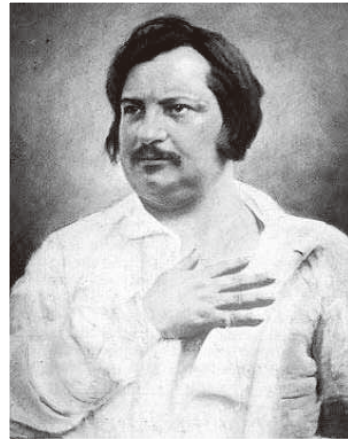
當今之世，討論巴爾扎克的重心可能會是他的小說詩學，作品接受度，以及重寫的必要性。不過近200年前，巴爾扎克所帶領出來的「現實主義文學」寫作模式，他的人物，他的書寫風格，以及他那前無古人的文學創舉《人間喜劇》一直都是中外文學研究者所不易錯過的。

巴爾扎克很早就思索將作品匯整成一系列的作品，從1824年的《法國畫像史》，1830年的《私人生活場景》，1831年的《哲理短篇論說及小說》，1834年此一設想已發展成一個龐大計畫，他在給未來的妻子韓斯卡夫人（Mme Hanska）的通信裡提到，他的作品將匯集成《社會研究》這個總題，下分《風格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和六個場景：《私人生活場景》、《外省生活場景》、《巴黎生活場景》、《政治生活場景》、《軍旅生活場景》、

《鄉村生活場景》)；並聲明三部分《研究》是代表社會的「結果」(即現象)、「原因」和「法則」。1840年，在但丁(Dante)名著《神曲》(*La Commedia Divina*/原意「神聖喜劇」)的啟發下，他決定將標題改為《人間喜劇》，它既強調人世間如戲的生活，又具諷刺與批判意味。1842年第一卷出版，1845年列出完整的書目(包括預計出版的書目)，該套書原計畫出版137本，但巴爾扎克只寫出了95本。

◎人物與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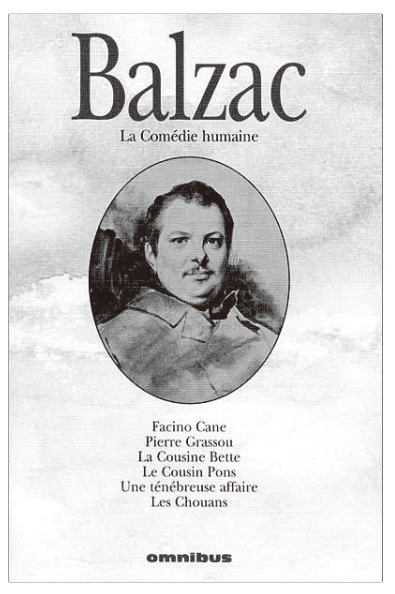
勤於筆耕、多產、快手(據傳記家指出，當巴爾扎克文思泉湧之際，經常夜以繼日地工作，疾筆如飛，幾十萬字的《高老頭》竟是三天內一氣呵成，《鄉村醫生》只花了72小時，《賽查·皮爾多盛衰史》是25小時內寫成……)，巴爾扎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的人物出場及刻劃。據統計，《人間喜劇》有三教九流各式人物2504個。自《高老頭》一書起，開始重複出現人物，計有573個。這些活躍在紙上的人物，有聲有色地演出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到1848年資產階級取得



最後勝利的一整段歷史。巴爾扎克筆下的人物沒有概念化、臉譜化的形象，人物無論主次、各個鮮活生動，血肉豐滿，幾乎每個人的性格都有多個層面，且與其獨特的經歷和處境息息相關。他眾多的人物中竟沒有一個完全雷同。簡言之，巴爾扎克關注的是人，著力的也是人，他認為文學藝術應該「借助思想，再現人的本性」為目標，藝術家的任務是「提煉過的思想，通過人物伴隨出來，塑造出讓讀者感到栩栩如生而又簡明概括的藝術形象。他正是要透過譜寫人類的血淚史來描繪當代風格和記述時代的變遷。」

巴爾扎克在寫給喬治桑的信中提到：「我喜愛特殊的人物，我自己就是。不過我得凸顯我筆下的販夫走卒，除非必要，我是不會犧牲他們的。他們比你們更引起我的興趣，我放大他們，理想化他們；相反地，我也放大他們的醜陋和愚蠢，我將他們塑造成無比可憎及怪誕的模樣。」

總之，巴爾扎克創造人物的方式大致循著以下三個階段進行：先找些知名或書中人物，然後將他們改頭換面成另一個模子；然後依著作品內部需要，而非文學換置的考量，加以安插。最後，像處於幻境般那樣，將人物改造，目的在體現某個理念。左拉曾語帶欽佩的說道：在巴爾札



克那些生動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臘羅馬的人物變得蒼白無力、渾身顫抖；中古的人物像玩具鉛兵般倒伏在地。」

由於創作量龐大，題材繁雜，加以部份作品略嫌急就章，巴爾札克的作品在當時一直被許多主張高雅文學的人士認為是粗糙、笨拙的流行文化商品。此外，過於壅塞的思想也讓人不堪重負，獨特古怪遣詞造句，誇張的形容詞也經常令人瞠目結舌。其實，因為人物逼真與形象的結合，巴爾札克經常深入底層，學習並使用他們的日常用語，甚至黑話、詛咒。再者，他對語言的要求，也可以從他一再修訂原稿校樣的自我要求看出端倪。此外，他還遭受許多非關文學創作的批評，包括不道德、保皇色彩、宣揚天主教信念，當時文壇的重量級文評家聖伯夫（C. Sainte-Beuve）甚至直接批評他的作品純屬「雜亂無章的大雜燴」，甚至是一種「墮落的風格」，巴爾札克安排人物重覆出現的手法，也被視為技窮的技倆，甚至違背美學的要求。

此外，他的同代人詩人波特萊爾可算是最能直接感受到他的「偉大、豐富和新奇」的人，他驚呼：「巴爾札克、偉大、了不起、且深入可測。他以奇特的方式反映出一種文明，還有它的全部奮鬥、全部抱負和全部瘋狂。」戈蒂耶（T. Gautier）認為巴爾札克的美學精準地出現在他所使用的「絕對現代性」裡。他還說：「他（巴爾札克）有一種風格，可能他自己卻不清楚，一種極棒的風格，是展現他的理念一種必要的、命定的、且無庸置疑的美學。」

根據許多巴爾札克研究學者的說法，巴爾札克作品的風格在之前並未引起過多的爭議，直到1950年代，以霍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為首的「新小說派」（Nouveau Roman）才找上他，並以此為其攻詰的箭靶，視它為陳腐、過時

的美學：「巴爾札克式的小說，透過敘述來標示背景的大概面貌，然後點出幾個特殊的元素。這種方式只談一些無足輕重的對象，或者只是任由它們如此而已。他自以為能再產生出一個早先存在的實體；它就這樣當下確立了它的創作功能。總之，他只是讓人看到事物。結果，此時此刻它似乎只是將它們摧毀了而已。」

另一位「新小說派」健將布托爾（Michel Butor）則走上另一端，依舊相當肯定巴爾札克，尤其是他所形成的影響：「我們以一種過於簡單的方式拿這種稱之為「巴爾札克式」的小說來與現代小說（即20世紀裡所有重要的作品）比較，並且拒斥它。不過，我們很容易就可以說出，事實上，當前「巴爾札克式」的小說只是從他的作品中的極小部分汲取靈感，而在過去50年當中，這位偉大作家真正的傳人是普魯斯特、福克納等人。」

評價及影響

做為一位文學家，況且還是一位眾所公認的現代文學奠基者、法國19世紀的文學巨擘，巴爾札克是成功的。「他向前走去，獨自一人，靠著邊，向前走，就像一個賤民。他難以抵擋的天才使別人想要將他逐出文壇，他本人所贏得的是藝術的真實〔……〕他從來沒有宣稱自己是改革者。他不是站在屋頂上高喊：讓我們使藝術回歸自然吧！而是辛勤地在孤獨中完成他那一部分文學革命。這是他生前忘年之交達文（Félix Dawin）所寫的一篇稱譽的〈導言〉。他的私淑弟子左拉也直指，巴爾札克的「革命」在於「扼殺了古老的體裁中的謊言」，從而「開拓」了未來，並成為「明日文學法國的領袖」。左拉所言不假，福樓拜、普魯斯特、紀德、紀沃諾（Jean

Giono) 包括左拉本人，以及成千百位的幾世代的法國作家莫不或多或少從他的身上汲取到創作的靈感。

當代「新小說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西蒙 (Claude Simon)，在他的近作《洋槐樹》(L'Acacia) 裡安排從集中營死裡逃生的男主角重新適應新生活，他的做法就是到舊書店買了十餘冊的《人間喜劇》，仔細的精讀；傾聽著風吹過屋頂、拍打著百葉窗……。這種閱讀可能索然無味，卻是最根本的方法，也唯有這樣才能醞釀出創作的可能性。法國文學史專家朗松 (Gustave Lanson) 指出，「只有人使他 (巴爾扎克) 感到興趣，一切描述都離不開人，一切描述都是為了揭示人。若要問到他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只能回答，他是描寫社會關係和人類本性的畫家。」另一位文學史家拉魯斯 (Pierre Larousse) 更貼切的描述做為「畫家」的巴爾扎克：「巴爾扎克是一位畫家，特別是一位風格畫家。他對私人生活、資產階級的風俗，平庸無奇的事物、內部場景、日常的小悲痛以及粗俗的感觸都極為細膩。在這樣的關係下，運用他觀察的洞悉力，及博學強記，提供了他寫出許多激動人心的情節。當他描繪一個人物時，人們會說那個模特兒就站在他眼前。」

的確，巴爾扎克確實將歷史比作畫布，但在他的創作及思考中，想像、洞察、觀察、分析，乃至透視 (voyant)、洞觀 (visionnaire) 都遠遠超過一介畫家。「對他來說，寫作是研究和說明世界的一種手段，與其說他是作為小說家來記述歷史，不如說他是以哲學家、歷史家和社會學家的眼光來寫小說。」當然，這當中是有「激情」，巴爾扎克不也就說過，「激情是創造之母」！簡言之，巴爾扎克筆下的所有人物都是某種激情的奴隸，所有的故事也都是某種激情的歷險。

巴爾扎克是跨疆界、跨時空的。透過翻譯，他不僅是19世紀「小說法國」的最佳代言人，也是各國作家景從欽佩，競相效尤的對象。從北方的俄羅斯到南方的撒哈拉沙漠，從西方的美國到極東的日本，當然也跨上了中國，人們欣賞又贊歎他爐火純青的小說技巧，包羅萬象的內容，活脫生動的人物刻畫，逼真寫實的社會批判，乃至他那發人深省的哲理及洞悉力等等。

華人世界最早引介巴爾扎克的作品始於1915年，由林紓 (他本人不通法文) 和陳家麟合譯 (採文言文意譯) 一本題名《哀吹錄》的中短篇小說，內收四篇哲理小說。1917年，周瘦鵑又增譯了幾個短篇，並附上一篇〈作者生平創作簡介〉。1930年代開始出現較多的譯本，著名的譯者有：穆木天、高名凱、傅雷、黎烈文、陳占元等人，其中傅雷可說是佼佼者，他一生共譯了13部巴爾扎克的作品，凡220萬言。當中著名《高老頭》(這個生動的書名也是由他所選定) 就重譯了三回。

在當時，巴爾扎克的作品應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歡迎的。我們可以從1945年由陳原在重慶所出版的兩卷《巴爾扎克諷刺小說集》的〈序言〉看出端倪：「使我吃驚的是，白魯因、陸易十一、希貢、魔鬼的化身、沙西瓦 (皆巴氏作品中的人物) 這些西方的魔影，竟穿了中國的民族服裝時常在這裡的大街顯靈。」

1949年之後，由於中共政權厲行反資本主義政策，翻譯巴爾扎克幾乎成了最「政治正確」的遙譯工作。當中以傅雷的例子最為鮮明。1984年起，中國大陸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花了12年的時間，動員了一時的翻譯俊彥，合集出版了一部1200萬字的《巴爾扎克全集》而達於高峰。該30卷的套書於1999年問世，並在北京配合擴大紀念巴爾扎克誕辰200週年活動。此項活動不僅深具

意義、舉世所無，甚至高過在法國本土所舉辦的任何一場紀念活動。2000年移居法國的導演、作家戴思杰還用法文寫了一本得了獎的暢銷書《巴爾札克與小裁縫》（*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r chinoise*）。之後（2002）還拍成電影。肇因竟是年輕時的戴氏讀過巴爾札克的中譯作品，如此給了他創作的靈感。

台灣「引進」巴爾札克的作品始於1955年。根據國家圖書館的目錄，截至目前共收了73筆譯本，其中未註明譯者及出版年的計有14筆。當中《高老頭》譯本就達27筆（37%）、《葛蘭德·歐琴妮》及《單身漢的家事》各7筆、《幽谷百合》5筆，合計共有18種作品。這些中譯本絕大多數都是大陸時期的舊譯作，重印或改頭換面的翻印本。在這73本譯作中，台灣本地的譯者恐不及三人。

結語

巴爾札克酷愛真實，崇尚真實，一生追求真實，他曾宣稱他的作品「既非虛構，亦非小說」，而是真實的故事。加上他自己的現實生活本就豐富多彩、波濤洶湧，尤勝於諸多小說情節。他亦曾在《高老頭》裡寫道：「小說家自以為創造的所有恐怖故事，其實總是比不上真實的……。」有論者指出，「高老頭」就是巴爾札克的分身，就是他自己。顯然現實生活裡的巴爾札克更多採於「高老頭」。事實上，每部他的小說創作都有著許許多多他親身的經歷生命體驗，及所見所聞。總之，就個別人物而論，他本人就是整部《人間喜劇》2504位人物之外更加精彩的一號人物。換言之，他早已把自己獻給了讀者。波德萊爾最早驚覺到這一點，他說過，巴爾札克是《人間喜劇》諸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最富詩意的一個」。

總之，巴爾札克這位「現代小說的奠基者」，既是全能無所不知的小說家，也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史學家，更像是一位奉獻一輩子生命給全人類的「普羅米修斯」（祂犧牲了自己為人類盜取天上的火種，這也是法國著名傳記作家莫洛亞（André Maurois）替他立傳的書名）。他以他的銳筆，他的文采，他的觀察和省思，深刻地描繪並「記載」了法蘭西史上最輝煌燦爛，也是最波濤洶湧的一段史詩。這段精彩無比的歷史正在不同的時空，在不同的社會，輪番上演。質言之，「談談巴爾札克是有益的。」（法國詩人奈爾瓦（Gérard de Nerval）語）

（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法文系教授，本文曾刊載於台南台灣文學館巴爾札克特展。）

